

現實主義典範的進步或退化： 以 Vasquez 採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 的論戰為焦點*

陳宏銘**

- 一、前言
- 二、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 三、Vasquez 的批判：現實主義理論的退步
- 四、相關學者的回應
- 五、交鋒之後：論戰的澄清和討論
- 六、結論

近來現實主義典範退化與否的討論，成為國際關係領域新的論戰。Vasquez 採取 Lakatos 所建構的科學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s）方法論之標準，直指現實主義在這過去二十年來所明白展現的理論的豐富性，根本就是這個典範退化的表現。Vasquez 就現實主義典範中之權力平衡研究綱領的理論系列為「攻堅」核心，以包括平衡（balancing）/ 依附（bandwagoning）、結盟（chain-ganging）/ 推諉（buck-passing）這兩組核心理論系列進行評估。其結論是，該研究綱領之一系列理論在整體上充滿著相互衝突的假設，但面臨經驗證據的考驗時，卻至少有一個可以通過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審評、推薦以及劉必榮教授的啟發與吳志中教授的評論意見。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講師、博士生。

投稿日期：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接受刊登日期：二〇〇三年六月二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3/第十七期/頁 53-91

測試。概率高，否證性低，沒有提供新事實，這是典範的退步。此一質疑，引來現實主義相關學者的強力回應。本文作者重新將 Vasquez 所運用的 Lakatos 研究綱領方法論放在科學哲學史的脈絡來理解，引介並評估這一論戰的內容。

關鍵字：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典範、研究綱領、否證主義、權力平衡

為什麼現實主義是優勢的？…在 Lakatos 對 Kuhn 的回應中，所有關鍵，最後在於區辨進步的與退化的研究綱領。在那個案例中，現實主義之所以優勢，在於除了異例之外，它對事件內涵的篩選和趨勢的確認，較之其理論對手更具啟發性，抑且更為豐富。

Hollis and Smith, 1990:66

現實主義的典範仍處於優勢地位而引領著研究，然而，其力道已不若 Morgenthau 在世時，同時也不及 Waltz 著作（1979）發表後的全盛時代。當前，即使是其信奉者，也存在著對現實主義的諸多疑慮。

Vasquez, 1998: 241

一、前言

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是一門社會科學，追求科學的知識並致力於理論（theory）的建構，以探索政治世界的種種奧秘。在接觸和探索政治學的知識時，我們經常面對各式各樣宣稱是科學的知識和理論，我們或者接受它，不然就得拒斥它。有時，一些舊理論還能以新的姿態復出，但另一些理論卻被對手所取代，而長眠於地下。什麼是科學的知識和理論？獲得科學知識的方法是什麼？如何說某一理論是成立的或被成功的否證（falsification）？如何評估典範（paradigm）的進步（progressive）或退化（degenerative）？這些問題，是當代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的主要關懷，¹ 也為當前國際關係領域研究者所重視。

二十世紀科學哲學的演進，從早期三〇年代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

1. 科學哲學向來是知識論（epistemology）的一部分，Karl Popper 指出知識論可以從兩方面來研究：一是當作日常的或常識的知識來處理；二是當作是科學知識問題。請參閱 Karl Popper（1959: 18）科學哲學關心的是第二個問題。

邏輯實證主義 (logical positivism) 的興起，歷經Karl Popper的「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之否證方法論、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之典範觀點與Imre Lakatos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以迄歷史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話，當代各種多元並存的觀點持續發展著。在政治學的課程中，科學哲學的知識往往成為方法論訓練的重要內容，但這類知識的傳授卻往往因為脫離具體的研究，而失之空泛。能結合這些知識論或方法論的內容以具體評估特定理論之發展，並不多見。近來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時有所聞，而在一九九七年刊載於《美國政治學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的一場關於當前現實主義 (realism) 典範是否退化的精彩論戰，堪稱是其中的少數。²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關於現實主義典範的適當性論辯自一九七〇年代起就相當的普遍。在歐洲，這經常被指為是典範間的爭辯，在北美，焦點則傾向被單獨放在現實主義途徑以及其所受到之批判。直至一九七〇年代末，似乎出現另一種途徑，如跨國關係與全球觀點，彼等儼然要取代現實主義典範。然而此一情況並沒有發生，部分原因在於「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的興起，特別是Waltz作品的出現。當前，關於現實主義典範的適當性論辯，又重新被點燃(Vasquez, 1997: 899)。

上演於《美國政治學刊》上的論戰，環繞在典範和理論的根本評價，攸關當代現實主義主要研究成果之整體貢獻，是一場高層次的知識論對話。此一論戰的發起人是 John A. Vasquez，他直指當前現實主義理論呈現一種典範退化的現象，現實主義理論在這過去二十年來所明白展現的「理論的豐富性」(theoretical fertility)，根本就是這個典範退步的表徵。現實主義當中，尤其在Waltz新現實主義權力平衡 (the balancing of power) 理論之後，新的、舊的研究和多重理論的轉換與發展之結果，使其一系列相關的理論在整體上

2.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當中，國際關係領域開始更明顯地對學科自身的發展進行反省，其中尤以 Thomas Kuhn (1962, 1970a) 的典範 (paradigm) 概念為此中翹楚。

充滿著相互衝突的假設，但面臨經驗證據的考驗時，卻至少有一個可以通過測試。換言之，其理論命題上相當豐富，難以被否證，但所能提供之經驗事實卻十分貧乏。現實主義理論透過新概念的引進和輔助假設的幫助，巧妙地掩飾此一知識建構上的精確性問題，此即理論上的倒退。用來評斷的判準，則主要是借用 Imre Lakatos(1970)所建構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架構。在科學哲學界，Karl Popper 和 Thomas Kuhn 等人名氣較大，Lakatos 是 Popper 的學生，是否證主義(falsificationism, 或譯「證偽主義」)的集大成者，其觀點在國內似較少人論及。然而，其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相當鮮明具體，且自成一家之言，影響深遠。Lakatos 的研究綱領旨在透過對理論系列(a series of theories)而非單一理論之評價方式，並運用「精緻的否證主義」(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ism)方法以論斷理論的進步與否。

Vasquez 的觀點無疑挑戰了現實主義理論發展的整體成就，引發相關學者的回應，包括了 Kenneth N. Waltz (1997),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1997),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1997), Randall L. Schweller (1997), Stephen M. Walt (1997) 等人均予以駁斥。這些學者有的從實質研究內容加以回應，認為 Vasquez 的質疑本身在實證上就不見得站得住腳；有的則從方法論出發，指 Vasquez 根本誤解了理論的意涵，尤其不該採 Lakatos 的標準來評價現實主義，因為 Lakatos 的標準本身也非權威，學者間針鋒相對，十分精彩。Vasquez 隨後在次年出版的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1998) 一書中，對原有觀點做了更完整的討論。在二〇〇二年底，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2002) 在合編的新書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著作中，也將之前相關學者的文章重新收錄於書中，同時增添若干新文章，書名附標題謂之為「新的論戰」，由此可見這場學術論辯恐非曇花一現，今後的發展仍值得學界持續關注。這場論戰結果誰輸誰贏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過不同學者觀點的激盪，一方面使我們對現實主義理論的評估能更為周

全，另一方面也使我們重新面對科學理論的反省。

本文旨在探討此一論戰，是一篇探索性文章，目的在引介學者的對話內容，並提出個人的淺見。擬說明的是，本文以該場論戰中關於現實主義內部的研究內容為焦點，至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十分多元，³ 跨典範間的論辯，諸如現實主義、多元主義（pluralism，包括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全球主義（globalism）間的比較，並不在討論之列。⁴ 此外，在當前國際關係研究的方法論中，雖然實證主義似乎仍居主流地位，惟亦有所謂「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時代的說法。⁵ 至若其他研究取向，像是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詮釋學（hermeneutics）、女性主義（feminism）⁶ 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等方法論之影響力，亦不容忽視。但這些方法論間的對話，屬於另一層次的問題，也非這一篇短文以及作者的能力所能處理。⁷ 本文以

-
3. 包括近來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興起對主流理論的挑戰，特別是在方法論（methodology）、本體論（ontology）與知識論（epistemology）上，影響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
 4. 學者對現存理論的分類和概念化並不一致，上述分類係根據 Paul Viotti and Mark Kauppi（1999）的觀點。關於不同理論間之論戰關係，請參閱 Ole Wæver（1996）。對於各階段的辯論，請參閱莫大華（1999: 65-90）。
 5. 實證主義的演進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九世紀早期 Auguste Comte 的社會學：採自然科學中主要依賴觀察（observation）的方法，建立了研究社會的科學（a science of society）；第二個階段是邏輯實證主義（有時被稱為「邏輯經驗主義」），以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崛起之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著稱，主導英語系哲學界至一九六〇年代末，該學派的共同信念乃科學是唯一真正的知識型態，脫離科學的理解則無法獲得真知；第三階段是自一九五〇年代末開始，在過去五十年對社會科學最具影響力，其衍生自實證主義，但反對完全建立在物理學的化約主義之科學觀和知識型態，以下是其主要三項特徵：邏輯主義-演繹邏輯、經驗上的實證主義（empirical verificationism）與 Hume 的因果論（關於因果關係的建立，是一種對觀察事件之間暫時性不變的發現），重要的學者如 Karl Popper、Carl Hempel，請參閱 Smith, Steve（1999）。
 6. 雖然一些女性主義者屬於批判論者和後現代論者，但其他人仍屬實證主義者，請參閱 Viotti, Paul R. and Mark V. Kauppi（1999: 20）。
 7. 有興趣瞭解者，可參閱 Viotti, Paul R. and Mark V. Kauppi（1999: 16-22）。至於現實主義在方法論的立場上，有學者指出其具有方法論的折衷主義的色彩，較免受認識論上的攻擊，比方說，現實主義傳統上即相當接受「語言即權力」（language is power）與論述（discourse）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許多後現代的（post-modern）辯論也關心到權力（power）、階層（hierarchy）、宰制（domination）等現實主義的傳統議題，請參閱 Barry Buzan（1996: 59）。

下分為五個部分：一、闡述Lakatos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二、描述Vasquez所揭開的論戰內容；三、分析相關學者的回應與觀點；四、交鋒之後論點的澄清與討論；五、結論。

二、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關於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之建構，須放在一個科學哲學史的演進背景下來理解，尤其是與 Popper 和 Kuhn 的關係。本文目的雖不在探索科學哲學史，但仍須就其核心背景略作描述，而後再敘明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之具體內涵，俾讀者能瞭解其中的脈絡。

(一) 背景說明：

Lakatos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與Popper和Kuhn關係相當密切，Popper所採取的並非所謂歸納（inductive）的方法，也不是可以證明的方法，而是透過由理論性地演繹（deductive）命題而加以否證的方法。⁸ Popper對Hume的因果問題之考察方法是反對的，但對於Hume在主張歸納法是無效的這一觀點上是贊同的。⁹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興起之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採用經驗主義（empiricism）傳統所建立的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以研究科學知識的結構，也是應用歸納法藉由假設來確認（confirm）理論。但Popper

8. 在社會科學中，有兩種一般模式（modes）是理論發揮的依據，分別為歸納的（inductive）和演繹的（deductive）方法。歸納法主要藉由經驗，將各種研究累積與結合而建立理論。演繹法則運用一種理論邏輯，以產生後續可加以檢定的假設有關係。

9. Popper 認為 Hume 關於歸納邏輯問題（Hume 本人未用過此術語）的處理和闡述是完美無瑕的珍寶。Hume 在《人性論》中有代表性的一段觀點如下：「…在任何對象中都沒有什麼東西（從其自身考慮）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理由以作出超出這個對象的結論；並且，甚至在對諸對象間的經常的或恆定的結合作出觀察之後，我們也沒有理由作出任何關於超出我們已經驗的對象的另外一些對象的推論...」。在這種意義上，Hume 的歸納邏輯問題之態度就是：我們是否有權利從無論怎麼多的已觀察到的事實中推論尚未被觀察到的事實，或者從無論怎麼多的「已知」（已被接受的）的陳述中推論「未知」（未被接受）的陳述，Hume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卡爾·波普爾，1989：109-117）。

反對此種方法，他改採演繹法以假設來「否證」理論，俾建立科學知識。換言之，這是一種所謂的「方法論的否證主義」（methodological falsificationism）。有時，Popper的否證主義又被指為屬於「單純否證主義」（naïve falsificationist，中文常被譯為「素樸否證主義」），而所謂「單純否證主義」又與「精緻否證主義」（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ism）相對照（關於此點下文中會加以介紹）。Popper認為在經驗上去「證明」一特定的假設或命題為真，誠屬不可能的任務，因為這需要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進行無數次的「測試」才能達到。科學的知識不是透過證明得來的，反而是要能禁得起否證的。科學家的任務在於建立假設或理論系統，然後用觀察與實驗來檢驗它們，這是一種「猜想與反駁」的工作（卡爾·波普爾，1987），「科學發現的邏輯」的任務就在於分析這種方法。

與邏輯實證主義相反，Popper認為科學的目的不是要提高理論的概率（probability），希望得到概率越來越高的理論；反之，是希望得到較好的理論。所謂較好的理論的首要條件，即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或可檢驗性較高。一個科學理論的可否證性程度越高，它的經驗內容就越多，同時概率就越低。受此影響，當代科學程序的設計，即要求理論之假設建構必須是以可否證的形式出現才行，也就是假設必須具備接受否證的可能。

Popper科學發現的邏輯觀受到Kuhn的反對，依照Kuhn的看法，科學史中並沒有上述嚴格檢驗和否證的方法，歷史上，每一個偉大的科學理論出現不久後，例如哥白尼的理論和牛頓的理論，都會碰到無數的反面事實可以使該理論遭受否證，但科學家並沒有按照Popper的方法論規範放棄它。Kuhn是歷史主義者，根據其觀察，根本沒有這種超越歷史的、放諸一切時代而皆準的規則。¹⁰ Kuhn在研究物理學發展史的基礎上，發展出「典範」（paradigm）這個重要概念。

Kuhn 和 Popper 一樣研究科學的發展，都反對將科學視為永恆真理的累

10. 這也涉及到進一步有關方法論無政府主義的討論，但這非本文討論範圍。

積，但 Popper 採否證主義來代替歸納主義，而 Kuhn (1962, 1970a) 則認為歸納主義和否證主義都不能給科學發展以合理的說明。科學發展的兩種形式：常態科學 (normal science) 和革命的科學 (revolutionary science)，都沒有普遍適用的方法論原則，因為方法論規則是隨典範的不同而有差異的。與科學哲學家不一樣，作為科學史家，Kuhn 仔細考察科學生活的事實，在這過程當中他發現，包括偉大的科學家在內的許多科學家之行爲，總是和公認的方法論準則相衝突，但這一點卻並不妨礙科學事業的成功。

Kuhn 反對 Popper 的單純否證主義，就此而言，Lakatos 既有別於 Popper，也對 Kuhn 拋棄否證主義的作法不以爲然。Lakatos 自成一家之言，以精緻否證主義替代單純否證主義，並建構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二) 研究綱領方法論：

由於 Lakatos 的研究綱領方法論乃是建立在精緻否證主義的原則上，因此首先說明後者，其次再探討前者。

1. 精緻否證主義 (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ism)

對單純否證主義來說，只要能被解釋爲實驗上可否證的，就是可接受的或科學的。對精緻否證主義者而言，一個理論只有當它確證其經驗內容已超過其前者（或競爭者）時，亦即只有當它導致新事實的發現時，才是可接受的或科學的。這個條件可以被分爲兩個從句：這種新理論具有超量的經驗內容；這種超量的經驗內容中的某些部分得到證實。另一方面，對單純否證主義者而言，一門理論是被另一與它衝突的「觀察陳述」否證的，但是對於精緻否證主義者來說，若要否證一門科學理論 T，則若且唯若另一門理論 T' 具有如下之特徵：(1) T' 的經驗內容超過 T：即它預言新事實，而這些新事實如按 T 的觀點來看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要被禁止的；(2) T' 解釋了 T 先前的成功之處，即 T 的所有未被反駁的內容都包含（在觀察誤差的允許範圍內）在 T'

的內容裡；(3) 某些 T' 的超量內容被確證（孔恩，1993：154-155）。

此外，按照 Popper 的否證主義方法論，即單純的否證主義，一個理論一旦付諸檢驗，就被判決了，或被接受或被判死刑。在一次決定性的交鋒之後，勝負底定，再無二話，這會使科學和若干理論還未開始就夭折掉。Lakatos 決心要補救這種情況，他採用「理論系列」（銜接而成研究綱領）（series of theories）來代替 Popper 的「理論」，亦即評價的不是孤立的理論，而是一系列的理論。他給一個研究綱領充分的時間，讓它發展，展現潛在力量，最後才給它判決。如果這個綱領引起有趣的新發展，產生「進步的問題轉換」（progressive problemshifts），那麼儘管它開頭很壞也可以保留。另一方面，如果這個綱領沒有什麼結果，產生了「退化的問題轉換」（degenerating problemshifts），那麼就應當放棄它另尋較好的研究綱領（江天驥，1988：16-17）。

2. 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如前所述，所謂「研究綱領」係由一系列的理論所銜接，用 Lakatos 本人的話，即「…理論系列的成員通常是與把它們銜接為研究綱領，一種非同尋常的連續性聯繫在一起；除了在一種研究綱領方法論的框架裡，這個關於發現邏輯的主要問題還無法得到滿意的論述。」（孔恩，1993：170）然則，具體的科學研究綱領究竟是什麼？Lakatos 舉出了以下兩項要點：(1) 消極性的誘導（negative heuristic）：綱領的核心；(2) 積極性的誘導法（positive heuristic）：「保護帶」的構成和理論科學的相對自主性。所以，研究綱領即一系列的理論所連結而成的具體研究內涵，當中存在著該典範的核心命題以及其他次要的命題和假設。一個典範不必然只有一個研究綱領，且研究綱領既是由理論系列所構成，是以典範也不等於理論。因之典範的評估必須透過具體的研究綱領來加以論斷，否則無法完成，亦即對一緊密相關的理論系列加以檢討。

我們可以將上述研究綱領的這兩項要點進一步分成四項要素：(1) 理論

「核心」(hard core, 或譯為「硬核」)部分：它由不變的、牢固的知識(privileged knowledge)所組成, 根據其信奉者的方法論判定, 它是「不可反駁的」; (2) 消極性的誘導：這是避免矛頭(modus tollens)指向這些理論核心, 亦即避免理論中不變的、牢固的知識遭受直接的挑戰; (3) 輔助假設構成的保護帶(protective belt of auxiliary hypotheses)：這是在理論核心所形成的保護。理論面臨考驗時, 輔助假設所構成的保護帶首當其衝受到檢驗, 必須進行調整再調整, 甚或全部轉換, 以保衛理論核心; 如果以上這一切導致一個進步的問題的轉換, 這個研究綱領就是成功的; 如果這一切導致一個退步問題的轉換, 這個綱領就是不成功的; (4) 積極性的誘導：指導著綱領內特定理論的產生, 係由一組或明或暗的提示、暗示所組成; 它們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種種變元(refutable variants), 如何修改、精鍊該可反駁的保護帶(拉卡托斯, 1993; Elman and Elman, 1997)。

三、Vasquez 的批判：現實主義理論的退步

介紹了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形成背景和內涵之後, 以下即可進入 Vasquez 對現實主義理論的觀點。Vasquez 指出, 現實主義是由二次大戰前一群研究者所主張的, 有別於威爾遜理想主義的一組理論。此一理論相信權力在形塑政治的重要性、以及權力政治實踐的普遍性, 並且主張外交政策無法信賴道德和理智的作用, 而應建立在利益與權力之基礎上。現實主義的典範意指不同的現實主義論者對於世界共同持有的基本假定, Vasquez 認為此項假定可以 Morgenthau 在 *Politics among Nations* (1948, 1978) 的主張為例, 他指出包括了以下三點： 民族國家(nation-states)是國際關係最重要的行為者； 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國際關係是為權力與和平的鬥爭。Vasquez 即意圖證明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是退化的。以下首先說明 Vasquez 對典範、理論的觀點、以及如何理解 Lakatos 之研究綱

領判準，其次分析他的具體論證內涵。

(一) Vasquez 的典範觀

Vasquez (1997, 1998) 雖反對 Kuhn 對否證主義的拒絕態度，但對典範的理解，深受其影響。Kuhn (1962, 1970a) 堅持常態科學的主要特徵在於主流典範指導著「研究」(research)的進行，而所謂的「研究」，意指「解惑」(puzzle-solving)的活動。在常態科學中，科學家的首要角色即在「解答疑惑」，這個疑惑是典範所關注的。然而，如果此一解惑釋疑的任務失敗，並非意味整體典範的潰敗；同樣的，持續性的不能勝任解惑之功能，亦非典範的錯誤，而是個別科學家的無能。準此，即使 Popper 的否證主義觀點能夠適用在個別的假設乃至理論之檢驗上，但想應用在一個研究領域(field)中的根本假定——即典範的評價之上，仍無法勝任(Kuhn, 1970a: 146-148)。

申而言之，常態科學中假設的檢定，是在同一典範下針對該典範所引導的相互競爭之假設所進行的測試過程，而非對不同典範下的假設所做的檢驗，後者已屬科學革命的範疇，是對世界觀點的改變，異於前者之常態科學時期。所以，Vasquez (1998: 104) 也指出，「研究即是典範引導的活動」(research as a paradigm-directed activity)。

關於 Kuhn 典範概念精確意涵的相關討論不勝枚舉，Margaret Mastermann 發現，單是在 Kuhn 自己的文本中，典範就有二十一種意義(孔恩，1993)，例如 Kuhn 曾將其界定為一種信念的群組(the constellation of group commitments)，或指是模範、共同的模範(shared example)，並不一致。如從 Kuhn 自己的界定出發，典範係指具有以下兩個特徵的科學成就：(1) 作者的成就實屬空前，因此能從此種活動中的敵對學派裡吸引一群忠誠的歸附者；(2) 著作中仍留有許多問題能讓這一群研究者來解決。Kuhn (1962) 本人對概念不清的質疑也坦承以對，但後來 Kuhn (1970a: 175) 認為，撇開不一致的使用典範一詞的事實，此概念有兩個明確的意義：「在一方面，它代表了信念、價值、

技術的整體集合，而被既定的社群成員所共享；在另一方面，它指出了此一集合的某種成分，藉由模型或範示所達的解惑功能，得以取代明確的規則……」。

Vasquez (1998) 認為，必須將 Kuhn 典範概念進一步明確化。他將其定義為：「學者對於其所研究的世界之根本假定」，此一假定提供了理論建構前必須先回答之問題的解答，這些問題包括：世界的基本組成單元是什麼？這些單元如何交互作用？對於這些組成單元，我們能問出什麼樣的有趣的問題？為了提供這些研究的解答，又需要建構什麼樣的概念？為了解答上述問題，必須形成根本的假定，這個假定提供研究者對這個世界的一個圖像，使其清楚地知道其所知者與其所未知者間之界限，並且知曉如果欲進一步知道所未知的世界之方法；最後，則是關於什麼才是值得去探知者，上述整體即構成典範的具體內涵。典範並非方法，比方說，物理科學發展中的不同典範可能均採用相同的方法和工具。但典範也異於理論，理論的轉變或消長，也非典範的變動，凡此，均說明典範、方法以及理論間的差異。

(二) Lakatos 研究綱領判準之運用

Vasquez 認為評估一個典範實屬不易，因其核心假設是很難測試的。典範的功能，在於使研究者得以透過特定的方式來觀看這個世界，而能成功地理解其研究之對象。因此，典範的評估必須視其是否能有效地、有能力地達致其所揭示的目標，典範的評價也就是只能從間接地透過對其所衍生出的理論之能力來加以判定。然則，何謂「理論」(theory)？Vasquez 將其界定為「一組旨在解釋行為而相關聯的命題 (propositions)」，他相信，在主流的國際關係領域內，Lakatos 所建立的判準在量化的與傳統的研究當中，均得到最大的共識。因此，他要以 Lakatos 所最強調的「理論系列」(series of theories) 的評價標準作為標的，而非只看單一的理論來論斷現實主義典範的進步或退化。

決定一個研究綱領是進步的或退化特別重要，因為許多分析都宣稱，現

實主義典範之所以是優勢的，在於除了異例（anomalies）之外，它較其理論對手提供更多且更豐富的內容。但現實主義不斷地修正，並不能視為一健康的現象，反之，這正好暴露了典範倒退的事實。Vasquez 試圖去證明為什麼這些修正是一種理論的退步，但他必須先提出他所理解的 Lakatos 的標準是什麼。

Lakatos 認為實際上沒有單一理論可以被否證，因為輔助（auxiliary）的假設可用來應付這些不符的事證。準此，重點不在評斷單一的理論，而在於如何去評價在知識上相關聯的「理論系列」。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即構成一理論系列，因為它們共享一關於世界運作的根本假定，用 Kuhn 的話，因為共享了一個典範，它們屬於「同一家家人」（family）。既然一個典範可以輕而易舉地產生一系列的理論，Popper（1959）的否證法在 Lakatos 看來便是有問題的，因為，一個理論可以透過逐步的方式被另一個所取代，而不威脅到共有的根本假定。所以，一個研究綱領，如果它的輔助假設只是用來滿足特別解釋，事實上沒有提供新的理論事實的話，那它還是退化的。Vasquez 強調，對 Lakatos 而言，實驗是不能用來扼殺一個理論的，因為任何一個理論都可以透過輔助性假設或透過概念上妥適地重新詮釋，以提供反證，回過頭來再挽救這個理論。既然如此，即應找出具體指標作為評估理論是否進步的判準。Vasquez 進一步將 Lakatos 的方法解釋如下：

首先，Lakatos 指出，二個面向必須同時滿足才能說這個典範下的理論或研究綱領是進步的，其一是「理論上的進步」（theoretically progressive）：即如果新修正後的理論能預測某些新的、迄今未被預見的事實的話，那麼此種「理論的轉換」（theoryshift）和「問題的轉換」（problemshift），即屬「理論上的進步」；¹¹ 其二是「經驗上的進步」（empirical progressive）：如果

11. 更進一步的意涵如下：假如有一系列的理論，其中每一個後續理論都在先前的理論上面添加一些輔助假設，以解釋某些與原先理論不一致的經驗異例（anomaly）。如果在解釋異例之餘，每個後續理論還能夠預測（或後測）某些前一個理論所未見的「新事實」（novel facts），則此理論的調整為「理論上的進步」（劉孟奇，1999：110）。

新的預測能夠被確證，而使得這個轉換後的新理論能夠相較於過去提供更多的經驗內容，則這種理論的轉換就是一種經驗上的進步。如果以上二者都符合的話，它就是進步的，否則就是退步的。因之，經驗事實所提供的否證，在這裡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次，他列舉四個指標作為理論退化與否之判準：

1. 如果對於原理論 T 的修正，主要是透過引進新的概念或其他改造來淘汰不符的證據，則從理論 T 轉換到理論 T' 就是一種退化；
2. 如果理論的修正從未指出任何新的可預測出的事實（Lakatos 指的是，新理論 T' 必須告訴研究者更多關於這個世界的訊息，不僅是那些不符的事證），則就是一種退化；
3. 如果新理論 T' 並無任何新的成功接受過測試的假設，或者是缺乏新命題（不僅僅是用來解釋不符的事證），那麼其實它並沒有提供超過原理論 T 更多的經驗內容，則就是一種退化的象徵；
4. 如果一研究綱領出現了許多的理論的轉換，且具有上列一個以上的特徵，並且，這些理論轉換的結果，使得這一理論系列集體而言充滿著相衝突的假設，但當面臨經驗證據的考驗時卻至少有一個可以通過測試。亦即至少一種說法可以迎合事實，從而使得整個理論系列立於不敗的地位，則它也是一種退化。

Vasquez 認為最後一項指標尤其重要，不過，該指標並不表示在同一典範下，不容許學者間有相異的觀點或存在不同的理論型態，而僅僅是說這些理論應當建基於對不同的而非根本上競相衝突現象的預測結果。因此，倘若形成愈來愈多相互衝突的理論預測，則這便是相當程度在邏輯上顯示了該典範趨向不可否證的情況。因此純粹的理論轉換，如果能做出新的預測，不一定就是理論的退化。反之，要達成理論的進步，則理論的轉換不能僅以解釋原有不符之現象為滿足，尚須能進一步彰顯原有理論能夠導引新的命題和預測，最終並通過經驗事實的檢測，而這些成就是未修正前的原初理論所力有未逮者（Vasquez, 1998: 246）。

Vasquez 即以這四個指標來檢驗，結論很清楚的是，現實主義的典範演進是退化的。他是如何論證的呢？

(三) Vasquez 的論證

Vasquez 認為從現實主義發展到新現實主義的各種觀點，存在著多種理論假設，看似內涵豐富，卻呈現出一種事實，即無論現實主義論者怎麼說，證據又如何，他們當中至少都有人是對的，於是該典範就立於不敗之地。就像擲銅板一樣，「人頭面，我贏；數字面，你輸。」所以，「無論如何，我都贏！」，現實主義的情況即是如此。透過對以下學者相關的評論，Vasquez 對現實主義的退化做了具體的論斷：如 Kenneth N. Waltz,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Randall L. Schweller, Stephen M. Walt. 我們進一步描繪之。

1. 現實主義研究綱領

Vasquez指新現實主義有二條路線。第一，對Kenneth Waltz(1979)而言，結構是影響所有其他行為最重要的單一因素；¹² 第二，Robert Gilpin(1981)指出政治經濟的因素，強調霸權興衰的影響。一般而言，Waltz主要關懷安全的研究，Gilpin則是探討國際政治經濟的問題。Vasquez主要以Waltz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論出發，並以Waltz等人的理論所構成的理論系列加以批判，作為證明現實主義理論是退化的主要評價標的。

從Kuhn的觀點來看，Waltz可視為是主流現實主義典範光環的一部分，他試圖「解惑」，這個疑惑是Morgenthau在*Politics Among Nations*(1948)一書所留下懸而未決的問題，亦即權力的平衡是什麼，又為何產生，以及權力平衡之概念在此典範中該如何發揮其功能之問題。既然平衡(balancing)的研究是新現實主義和現實主義典範的核心關懷，研究範圍廣泛，且吸引大

12. Waltz將結構主義帶進現實主義，其觀點被稱之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

批的學者投入，因此是用來測試該典範之研究綱領能力的最好案例。再讓我們回到典範和研究綱領的概念，在這裡，新現實主義和現實主義即是典範，但典範只能間接地透過其研究綱領的成敗與否加以判定，也就是必須以「一系列的理論」為測試對象。此處一系列的理論，即環繞在權力平衡的研究之相關理論上，其具體研究即視為是現實主義的一項研究綱領。Waltz 的研究影響了後來許多年輕一輩的學者，他們的研究命題相當程度是在建立 Waltz 平衡研究的基礎上，如包括 Walt (1987), Schweller (1994),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0), Mastanduno (1997), Schroeder (1994a) 等人在內即是。這些學者彼此間也相互引用對方的研究觀點，其中討論依附 (bandwagoning) 或威脅平衡 (balance of threat) 主要引用 Walt (1987) 的觀點，而討論推諉 (buck-passing) 則常引用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0) 的觀點。以下，即以平衡研究的兩組系列的理論為分析焦點，論述現實主義在平衡研究上研究綱領的能力，這兩組相關理論即平衡 (balancing) 與依附 (bandwagoning)、結盟 (chain-ganging) 與推諉 (buck-passing)。

2. 平衡 (balancing) 與依附 (bandwagoning)

Waltz 認為，如果說國際政治存在著什麼明顯的理論的話，那就是權力平衡理論，這是國際政治的根本法則 (fundamental law)。不同於國內政治，在無政府狀態下，權力平衡才是典型之作，而非「依附」效應 (bandwagoning, 類似「西瓜靠大邊」效應) (Waltz, 1979: 126)。¹³ 亦即，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人人自危，自力救濟的體系結構因素促使國家的行為趨向權力平衡的產生。當兩個條件抑且只有兩個條件吻合時，權力平衡的政治會出現：無政府狀態與體系單元追求生存 (Waltz, 1979: 121)。Waltz 的著作遠較 Morgenthau 對權力平衡持正面看法，這是一種理論的轉換，旨在解答平衡是

13. 對 Waltz 而言，「依附」(bandwagoning) 是指與力量最強者 (也就是能建立霸權者) 相結盟，這對尋求生存的國家是有害的。Walt 也是這樣界定，但他引進「威脅」這個概念：「平衡」是與他方結盟對抗威脅，「依附」則是與危險的來源結盟。

不是與「和平」相連結，Waltz的答案是否定的。由於經常需要透過戰爭以繼續權力的平衡，所以權力的平衡並不總是能確保和平，Waltz所要強調的是國家的行為趨向於平衡的結果，而不是平衡能避免戰爭。此外，平衡是自動產生的，是體系結構力量所驅動，不是特定領導人外交政策的結果。關注於體系的結構，並確認無政府狀態是解釋所有國際政治的核心要項，這是Waltz最初的兩個貢獻。他的研究引進新的概念，既簡約且優雅，反映在平衡研究和兩極比多極穩定研究上，影響很大。理論解釋了過去沒有解釋的現象，發現了新的事實，構成了進步的理論轉換現象。但爾後相關系列理論的研究成果，長期而言，卻不進反退，這可以從以下「權力平衡」理論轉向「威脅平衡」和「利益平衡」看得出來。

同樣是現實主義者，Walt以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中東地區為研究焦點，替Waltz的權力平衡法則做了測試。Walt（1987: 33）與Waltz均認為「平衡」要比「依附」效應常見，但兩人的差異在於，Walt認為平衡乃導因於「威脅」（threat）而非權力，他的結論是「威脅的平衡」理論要優於「權力的平衡」理論。Walt將其分析進一步擴展至東——西陣營關係的研究，並指出如果國家那麼關心權力，則當時應該不會形成與美國那麼廣泛的結盟以對抗蘇聯，結盟的產生來自於對威脅的想像，絕非基於對於蘇聯權力考量的結果。從這項研究發現來看，Walt是在否證Waltz的觀點（Lakatos, 1970: 116），但對於這項與Waltz觀點相反的事實之處理，Walt採取了判定其為知識成長（incrementalist）的立場。他很明確的堅稱，威脅的平衡「應該視為對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的精煉（refinement）」（Walt, 1987: 263）。然而，這為什麼是一種精煉？（Vasquez, 1998: 255）Vasquez認為如此一來，平衡理論變成二種，其中任一種都能用來支撐現實主義這個典範，而減少被否證的可能性，（Vasquez, 1997）（指標四），這無疑是一種研究綱領和理論系列的退化。

再就「依附」效應來看，Schweller（1994）主張此種現象比平衡要來得普遍，與Walt看法恰好相反。他也提出另一理論，即「利益（interest）的平

衡」，認為吻合古典現實主義主張國家追求權力和擴張的基本假設，因此要比 Waltz 要來的更是現實主義。但是，如果 Schweller 的看法錯，那麼之前 Waltz 的觀點就是對的；反之，若 Waltz 的看法錯，那麼 Schweller 就是對。總之，有一個一定可以被證實為真，至此，Vasquez 再度質疑：「究竟在什麼情況下，現實主義才算是沒有通過經驗的測試？」。研究者引進新概念，巧妙地透過語意上的標籤來化解原有理論所窮於解釋的異例，這是違反 Popper (1959) 的「否證性」(falsifiability, 或稱可證偽性) 的原則。換言之，引進新概念以改造並淘汰不符之證據(指標一)，沒有預測出新的事實(指標二)，缺乏有效的新命題以提供超越原有理論的經驗內容(指標三)，此即研究綱領和理論系列的退化。

3. 結盟 (chain-ganging) 與推諉 (buck-passing)

前述關於依附的研究並非現實主義僅有的退化徵兆，從結盟與推諉的研究可進一步獲得佐證。

Vasquez 指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0) 在處理平衡理論失敗時的研究，也是現實主義典範退步的重要例證。Christensen 和 Snyder 批評 Waltz 在處理多極體系的平衡問題時太過簡約，以致於做出含糊的預測，他們想要藉由結盟 (chain-ganging) 與推諉 (buck-passing) 的觀點來矯正這項現實主義的缺失。所謂的結盟，係指當國家——尤其是特別強有力的國家，無條件而不顧一切地投入結盟，而此結盟的生存被視為是維繫平衡所不可或缺的。至於所謂的推諉，乃是平衡失敗的結果，而且依賴第三者來承擔由於遏阻一個崛起中的霸權所需之成本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0: 138)。因而結盟是類似無條件的，不計成本的緊密合作；推諉則是衝突結果未明，且集體力量已然強過威脅者時，欲節省成本支出的投機行為。至於國家從事結盟或推諉，則是建立在國家對於攻擊與防禦策略間求取平衡的一種「知覺性的」(perceived) 判斷結果。

二次大戰的結盟模式被視為是結盟的範例，而歐洲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情

況則是推諉的佳證。結盟與推諉的命題只適用在多極體系之下，因為在兩極體系下，Christensen 和 Snyder 認為「平衡」的解釋並無不當之處。換言之，Christensen 和 Snyder 認為，平衡理論在兩極體系下並無問題，但在多極體系下，則國家若不是從事「推諉」即選擇「結盟」。經此一說，則無論是在兩極或是多極體系的情況，幾乎都有適當理論加以應對，現實主義因而能立於不敗之地。Vasquez 認為，這又是現實主義典範在常態科學表現上出現爭議的另一案例。由於研究者先找出 Waltz 解釋的一些縫隙，而後試圖借助於 Jervis (1978) 攻擊和防禦的變項去矯正它，他們關心的是，除了兩個時期都是多極體系外，一九一四年之前的結盟行為是異於一九三〇年代時的情況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7: 919)。然而他們的解釋方法和問題的釐清雖然給予外界一種印象，看似即理論朝向知識累積與進步的方向前進，然而如加以細究，當可發現這樣的修正卻是理論上的退化。這個退化來自兩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這一系列的研究宣稱在多極體系下國家不是從事推諉即從事結盟，這無異承認在重要的案例上如一九三〇年代的情況，並未如 Waltz 所描繪的，國家會由於體系結構的原因而趨向平衡。Waltz (1979: 121) 清楚地預測：「當兩個條件，而且只這有兩個條件吻合時，權力平衡的政治會出現：無政府狀態與體系單元追求生存」，很清楚的這兩個條件在二次大戰前時期是符合的，不過，其結果是平衡的失敗，這項失敗理應視為可用來作為否證平衡理論的證據，Christensen 和 Snyder 應該更明白地承認這項事實。但相反的，他們粉飾這項事實而代之以推諉的理論。Waltz 從未說過在多極體系下國家不會趨向平衡法則，只是說會比較困難而已，因此，Christensen 和 Snyder「挽救」Waltz 理論的方法不是正視上述的平衡理論解釋上的異例和不符合原有理論的經驗證據，而卻是去圓飾這個理論本來應該準確預測的重要事實。從 Lakatos 關於理論進化或退化的第四個指標來看，這即產生了一種使否證的機率降為很低的情況。這是第一方面。

再者，人們可以辯稱說 Christensen and Snyder (1990) 建立在攻擊與防禦的命題原則上仍可否證，雖是如此，這卻帶來分析上的第二個問題。簡單

地說，如 Levy (1984) 所言，攻擊與防禦概念是極其爭議，很難操作化，他個人即無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去區辨究竟是採攻擊或防禦較為有利。很清楚的，即使是當時的軍事專家也並非總能判定其所處的年代是偏好攻擊或防禦，否則他們應該會了解到，在一九一四年時採防禦比採攻擊來得有利。

此外，Vasquez 又舉 Paul Schroeder (1994a, 1994b) 對於現實主義典範中國家是單一理性行為者說法的挑戰、以及他對 Waltz 關於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平衡理論的質疑為例，追問同情現實主義的學者會如何回應？Vasquez 以 Elman and Elman (1995) 為現實主義辯護為例，說明類似的辯解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倒退。他們的看法有二點，第一，即便 Schroeder 挑戰了 Waltz 的理論，也不能說他挑戰了其他龐大的現實主義途徑，「平衡」並非現實主義所主張的唯一策略，何況是 Waltz 本人也意識到非平衡情況的出現，所以不應以此來攻擊 Waltz。第二，只有更好的理論才能取代原有理論，所以 Waltz 的理論不應被摒棄，除非有一更好的能取代它。Vasquez 認為這都是不能成立的辯解，他反覆申論，究竟如何才算是駁斥了一個典範呢？現實主義的主流論述，提供了相當狹窄的經驗基礎可用來否證自身這個典範。

四、相關學者的回應

Vasquez 的文章，引來相關學者的回應。對於這些回應的呈現，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根據論戰的焦點，就其內容之異同綜合論述；二是保持個別作者的觀點，依次描繪。本文採第二種方式，主要是考量每位回應者之觀點與其知識論和方法論前提的連貫性，因此保有學者個別的論述體系較為清楚。以下我們依序說明包括 Waltz, Christensen and Snyder, Elman and Elman, Schweller, Walt 等人主要的回應。

(一) Waltz

Waltz 是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其理論是 Vasquez 評價的核心。Waltz 認為 Vasquez 不僅誤解了典範，同時對理論的看法也有問題。Vasquez 將新的和舊的現實主義放在同一個現實主義的典範中加以討論，這是基於這些不同的理論具備共同特定的基本假設，實則這樣的理解是有問題的。新的和舊的現實主義是建立在不同的假設之上，由於確信國家會追求更多的權力，所以 Morgenthau 將權力本身視為是目的；相對的，Waltz 指出他的結構理論卻建立在「生存」(survival) 才是國家的目標的假設上，而權力僅是達致此一目標的手段之一。再者，政治學者通常建基於兩個典範，一是行為的，二是體系的，舊的現實主義者屬前者，認為國家行動是原因，直接影響結果；新的現實主義者屬後者，認為國家的行動乃是先受國家間互動所形成的體系結構所影響，各個國家是在無政府狀態的自力救濟體系 (self-help system) 當中尋求共存，國家行為和結果乃取決於國家所處的相對結構位置。由此來看，單一典範實無法協調上述差異，Vasquez 誤解了典範的真實意涵。

Waltz 認為 Vasquez 不僅誤解了典範，抑且對理論的看法也有問題，他將理論鬆散的界定為：「一組旨在解釋行為而相關聯的命題」，但如果相關的命題便可構成理論，那 Vasquez 當然可依其標準找出很多理論。Vasquez 宣稱，觀察到的事實與預測不符，即可以用來推定理論的失敗，然而，理論和事實之間存在互賴難解 (puzzle) 的關係，理論既非真理的集合，也不是現實的再版。理論是「人類運用智慧針對某範疇之內的活動或一特定領域事物所描繪出來的圖案」(Waltz, 1997: 913)，任何事物都有無數的組織方式，理論告訴我們那些比較重要，並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每樣事物之間或多或少都有些關係，很難截然劃分，理論劃清某項事物的範圍，讓我們的智慧能夠有效的思考，這正是建立理論的先決條件。問題不在於這麼做是否合乎事實，而在於它是否有用。

Waltz在某些觀點上雖然並不同意Lakatos，但對於單純的「檢測」(test)

並無法「否證」(falsify)理論，在這一點看法上並不反對。¹⁴ 如Lakatos所言，理論不僅無法證明，抑且不能反證明。Waltz認為，在自然科學家當中，「否證」法是很少被用的方法，如同諾貝爾物理獎得主Steven Weinberg所言：「沒有理論不被某些實驗所駁斥。」Lakatos認為，單純的否證既不可信賴，所以建議以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的「豐富性」(fruitfulness)來評價一個理論，因此，理論只能是被一更好的理論而推翻。Vasquez挑戰權力平衡理論，舉出包括Morgenthau在內的很多學者都不支持此一理論為例，這又一次顯示出錯誤的將所有現實主義理論視為同屬於單一典範。Vasquez指出權力經常不平衡，因此國家的行動有時並沒有帶來體系的平衡，然而，僅此是否就能推翻結構理論的有效性？Waltz指出，經濟學理論假定，在完全自由競爭下的市場會是均衡的，然而事實上我們卻很少發現市場是真正均衡的，但這並沒有推翻此一理論的功用。所以，說國際政治體系強烈地趨向平衡，而當其結果卻很少如此時，這之間並沒有衝突。

對於Vasquez以Schweller和Waltz的理論間之不同看法來佐證現實主義理論的退化，Waltz也提出辯護。雖然Schweller與Morgenthau站在同一立場，主張國家追求更多的權力，且「依附」比「平衡」更常出現，但Waltz認為結構理論並沒有錯，當國家的處境應採平衡策略，其結果卻採「依附」策略向強者靠攏，必然會帶來損失。他以墨索里尼時代的義大利為例，當時義大利本應採取平衡的策略，但卻選擇依附而加入希特勒陣營，因此犯下喪失政策控制權的錯誤。這說明理論雖然沒有指導國家政策，但仍可描繪出其預期之結果，就此而言，結構理論(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是成功的。如同經濟學理論，權力平衡理論並不意味多數時間下體系都維持著平衡，而是指不管主觀上願意與否，隨著時間的發展體系終將趨向平衡的狀態。至於Waltz的威脅(threat)的平衡觀點，只能說是外交政策決定者在面對結盟決策時如

14. Lakatos 是反對教條式否證主義(dogmatic falsification)。教條式否證主義反對古典的證明主義和古典證明主義的或然率理論，而持科學是透過推翻理論發展的，只要理論可否證—透過有限量的事實來否證，即是可以接受的。Lakatos 反對這種觀點，所以採取對系列理論的評價取代單一理論的否證。

何思維的一種描述而已，並不能說是一個新的理論。最後，Waltz 認為評估一理論的能力，解釋要比預測來得重要，套一句 Steven Weinberg 所講的話：「對物理學的進步的最重要事情，不是判斷一個理論是否為真，而是判別它是否值得嚴肅地對待。」Waltz 認為，他在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一書中所揭示的結構理論，便通過了這樣的檢驗。

(二) Christensen and Snyder

Christensen 和 Snyder 指 Vasquez 誤解了他們大部份的觀點，他們與新現實主義一樣，相信權力的考量是國家領導人計算的核心因素，而無政府狀態經常形塑了當中的策略選項。他們同樣相信包括國內政治、認知 (perceptions)、意識形態等在內以及其它因素也很重要，但謝絕其理論被歸類為新現實主義。Christensen 和 Snyder 採用了「知覺的」(perceptual) 變項，遭受 Vasquez 的批判，但他們認為其研究較原有理論解釋得更多，相當簡約 (parsimoniously)，很成功的適用在新的領域，並且沒有帶來與原先理論的核心內涵相衝突的命題，因此符合了 Lakatos 進步的「問題移轉」(problem shift) 標準。

Christensen 和 Snyder 也利用 Waltz 和其他學者的工具來解決所關心的問題：探討在多極體系下面臨威脅時，尋求無條件的結盟而非推諉的條件。他們主張領導人對於戰略環境的認知才是決定結果為何的核心變項，而不是客觀的條件如何，這樣的觀點是傳統現實主義所欠缺的。Vasquez 沒有認識到他們理論的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 並非平衡，而是使平衡過程複雜化的結盟問題。且該研究結果也支持 Waltz 的觀點，認為多極體系較兩極體系不穩定，結盟的動力較為複雜而不確定，在這樣的結構條件下，錯誤的計算與認知很容易出現。因此，Vasquez 對他們的作品和對 Waltz 的觀點之批評，同樣不足取。

(三) Elman and Elman

Elman 和 Elman 採取的幾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來辯護，即同樣以 Lakatos 的具體判準來回應 Vasquez 的質疑。Vasquez 說他們以下的二個論點顯示了現實主義理論的退化：一、雖然國家間並未達成平衡狀態的證據可以挑戰 Waltz 的權力平衡理論，但卻無傷於現實主義的研究綱領；二、一個綱領在被拋棄前應加以改善，除非有另一個選擇能取而代之，否則不能被拒斥。Elman 和 Elman 指出，他們仍站在上述這二個論點的立場上，而且堅持這並不構成新現實主義的退化。基本上，Vasquez 的結論是由於錯誤的引用 Lakatos 的判準，並誤將「新現實主義的研究綱領」與「權力平衡的命題」混為一談。Vasquez 所引的四個進步或退化的操作性判準，是屬無效或並不完整。所謂理論的進步，必須新理論 T' 能提供「新的事實」，但「新的事實」應如何界定？Vasquez 認為新現實主義同時允許平衡的行為和不平衡的行為並存，怎麼樣說這種理論都站的住腳，難以否證，彰顯了理論退步實。然而，這種指控是一種誤判。

Vasquez 以 Lakatos 方法論為標的，可是卻忽略了 Lakatos 的另一個重點，即「研究綱領」的四個要素，它們分別是：理論核心、消極性的誘導、輔助假設構成的保護帶、極積性的誘導，科學的研究綱領的應用必須所有這四個要素均能確立，但 Vasquez 並沒有說明此點。其實他們舉 Lakatos 的此一標準，主要是說明理論的修正不過是透過輔助假設的調整，只要沒有摧毀原有的理論核心，並不能遽而判定這樣一種理論的移轉就是退步。此外，Vasquez 也誤以為 Walt, Schweller, Christensen 與 Snyder 同樣一體關心權力平衡，因而屬同一研究綱領之下，其實，新現實主義並非異口同聲都主張權力平衡。¹⁵ 最後，

15. 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核心可歸納如下：1. 國家在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中互動，缺乏橫跨交錯的權威提供保護；2. 國家是自我取向的，其結果是自力救濟為體系所賦予的行為規則；3. 生存的威脅是體系所生的主要問題，其結果是國家行為在於確保生存；4. 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5. 國家僅擁有能促進其生存的有限資源，因此關心那些資源的維續與增進；6. 國家選擇獲利多過損失的策略；7. 國家基於戰略情境和外在環境的評估而做出決策選項 (Elman and Elman, 1997: 924)。

Elman與Elman同樣指出，只有更好的理論才能取代一個理論，這也顯示科學的研究綱領方法論的好或壞，其實是比較性的，而非絕對的。

(四) Schweller

與之前的幾位學者不同，Schweller 從一種更高的層次來討論問題，他認為現實主義根本就是一種政治哲學（philosophy）和「眼界」（perspective）。他與 Colin Elman 和 Miriam Fendius Elman 持同樣觀點，認為當異例（anomaly）出現而經驗證據帶來挑戰時，輔助性假設的保護帶可能改變但不致危及理論核心，因此現實主義不斷的在修正和創新。

政治現實主義不僅是「科學」的研究綱領，更是一種政治哲學和世界觀，因此超越了特定的命題或可受測試的假設。所有的現實主義者都享有一悲觀的世界觀，即假定團體間為了安全、地位和權力而存在著永久的鬥爭，並且否認人類的理性具備了創造世界和平共處的能力。近來所謂的新傳統現實主義（neotraditional realists）並沒有和 Waltz 的平衡假說相衝突，反之，這些作品傾向於加入單元層次（unit-level）的變項，用以將 Waltz 的國際政治理論轉換成一種外交政策。問題不在於國家間是否「平衡」或「依附」，事實上二者兼而有之，真正的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條件使得國家採取其中某一種策略。Vasquez 認為只有一種「真理論」的現實主義，並且，Waltz 的平衡假設提供了一種判斷科學研究綱領是否退步的測試，這二個論點 Schweller 都不同意。現實主義主要的問題不在於不斷出現修正，而是在於缺乏明確揭示的範圍條件（underspecified scope conditions）。其實，沒有任何單一界定的政治現實主義，而是有許多現實主義理論形成一理論眼界，成為優勢的研究綱領。其核心不是 Waltz 的平衡假說，而是以下七個關於國際政治的假設：1.人類之間的互動，是以要求忠誠的團體成員身份為主，而非以個體身份行之；2.國際事務是在無政府狀態下進行的；3.權力是國際政治的根本特色；它是確保任何國家目標的國際通貨（currency）；4.國際互動的本質是衝突，沒有衝

突的世界是生命已經終止的世界；5.人類無法藉由理智來跨過衝突而能發現達致和平的方法；6.政治不是倫理的運作，而道德是權力的產物；7.國家的需求和理智擊敗道德和倫理，倘若這些價值發生衝突的時候。這些現實主義的核心內涵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就好比理性（rationality）在經濟事務中的地位一般。

關於權力平衡理論，Schweller 認為平衡是要付出極多的風險，國家寧願不參與。「依附」則較少風險，一般可預期獲利，所以較「權力平衡」普遍，但這非結論。Vasquez 指 Schweller 的利益平衡理論比 Waltz 更現實主義，因為其理論建立在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上——國家追求更多的權力和擴張，而非如 Waltz 所假定的是追求安全之上，但 Schweller 認為 Vasquez 的這種詮釋只對了一部分。因為，當代的現實主義者如 Walt 和 Waltz，均假定國家滿足於權力的現狀，而非追求權力，國家目的在於極大化其安全。這樣的論述固然忽略了追求權力的現象，但並非與利益平衡理論相衝突，因為該理論包括二個部分，一是修正主義的國家（revisionist states），即國家尋求增進其權力；另一是現狀國家（status-quo states），即國家尋求鞏固現狀。Waltz 的理論的真正問題在於：當生存已能確保時，新現實主義要解釋什麼？這是 Schweller 要建立利益平衡理論的用意，但不同於 Walt，他主張當沒有威脅存在時，國家將傾向「依附」。

(五) Walt

Walt 認為如照 Vasquez 運用 Lakatos 的標準來看，那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的理論都難以成立了。理論之間的衝突，不一定代表理論的退化，實際上可能顯示其一是正確的，而另一是錯誤的。另外，他更挑戰 Vasquez 所引 Lakatos 的判準。整個來看，他認為 Vasquez 對於現實主義的評價，出現以下三個瑕疵：

第一，Vasquez 採 Lakatos 的模型是有問題的，因為該模型已大為當前的

歷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所放棄。Walt 質疑，為什麼要接受已被許多學者放棄不用的觀點？且 Lakatos 並沒有釐清當前我們所知道的關於什麼是「科學的發現」。首先，Lakatos 提出所謂「理論核心」（hard core）的說法，但歷史顯示，科學家們對於其理論的核心要點經常存在歧見。且所謂理論核心不會遭受挑戰，理論的外圍內容才會，此種觀點忽略事實上理論核心也常是爭論重點之所在。其次，Lakatos 認為對立的理論之間的抉擇標準，在於何者提供「超量」的經驗內容（excess empirical content）。也就是說，如果新理論 T' 能解釋所有舊理論 T 所能解釋的，而又同時能提供一些過去無法預測到的新事實，那麼 T' 就是進步的。然而，判定新事實的經驗內容之比較，在實踐上是有困難的，這使得所謂「進步」概念的測量，難以操作化，不能成為一有用的指導原則。

第二，Vasquez 低估了現實主義研究綱領的範圍和分歧，並且誤判了現實主義者間的歧見，以為這是理論退化的鐵證。他誤將 Waltz 視為單一標準，現實主義實包括大量相互衝突的理論，彼此間雖有基本的共識，但也有很多的歧見。所以，衝突的論述與歧異的結論，並不代表理論的退步，而某一個別理論的失敗，亦不代表現實主義理論的全盤皆輸。真正的問題在於現實主義是否更增進我們對國際關係的了解。

第三，Vasquez 忽視了當前現實主義理論的進步特質，而這導因於沒有考量到所有的相關文獻。事實上，存在或橫跨於研究綱領中的歧見，為進步之所需，理應加以歡迎，怎麼會是退步？

五、交鋒之後：論戰的澄清和討論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試圖將這場論辯的內容，儘可能加以忠實的描繪。從其中，我們可以更深層的了解到，現實主義理論研究十分多元，實是龐然

大物。¹⁶ Vasquez 捨棄對單一理論的批判而直指整個現實主義理論典範的倒退，此一挑戰不僅大膽，抑且十分艱難。Vasquez 的壯舉勇氣十足，但面臨來自兩方面的質疑：第一是他引用 Lakatos 的判準，但被質疑沒有完整引用 Lakatos 的判準，諸如關於理論核心、輔助假設的保護帶等研究綱領的構成要素。第二是被質疑有簡化不同理論觀點的缺失，導致被引用觀點的學者不同意他的二手詮釋。尤其該文以 Waltz 的新現實主義之權力平衡理論為基點，並舉出其他相關重要研究所展開之論證，此種縮限焦點的方式雖然其本人於文中明確交待，但仍構成推論上的基本缺憾。

然而，Vasquez 的「攻堅」是否失敗？以下筆者擬分為二部分進一步提出己見申論之，首先還原 Vasquez 的論點以說明本文立場，其次再扼要的評論 Waltz 等人的回應。

(一) 再論 Vasquez 的觀點

這場論戰應還原到兩個根本的問題，即 Vasquez 的主要論點為何？其採用 Lakatos 的科學綱領方法論是否適當？

對於第一個問題，作者認為 Vasquez 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推翻或否定整個現實主義典範，也不在於指陳其它的典範和理論可以取而代之，而是在說明其核心理論的發展和研究問題的轉化出現退化的現象，此即典範倒退的徵兆。不過，典範的退化並不代表理論的失敗或典範的根本瓦解，誠如本文一開始所引 Vasquez (1998: 241) 的話：「現實主義的典範仍處於優勢地位而引領著研究，然而，其力道已不若 Morgenthau 在世時，同時也不及 Waltz 著作 (1979) 發表後的全盛時代。當前，即使是其信奉者，也存在著對現實主義的諸多疑慮。」由此看來，Vasquez 尚且不否認現實主義所處的優勢地位。

16. 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涵十分多元而豐富，舉例而言，在理論的劃分上除了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之區別外，Stephen G. Brooks (1997) 更以國家行為的許多不同的假定，區分為以 Waltz 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與「後古典的現實主義」(postclassical realism)。

對於第二個問題，即 Vasquez 採用 Lakatos 的科學綱領方法論是否適當？其實，判定方法論的適當與否乃視研究問題的性質而定，這是比較性的，難以一概而論。持平而論，Lakatos 理論系列的評價方法並不適合用在單一理論的檢驗上，而較適合於能涵容多元理論的單一典範。就此而言，採精緻的否證主義法，透過對一系列的而非孤立的理論進行評判，亦即將評價理論轉換成評價理論系列，將之應用在對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中現實主義的典範之上，應是適當的。我們可以換另外一種問法，如果不採用 Lakatos 的觀點，那麼應採用什麼具體的判準？還是不可能有共通的判準，而不免陷入所謂方法論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對於這個問題必須再回到 Vasquez 的方法論前提，在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1998) 一書中，他相當清楚地討論了評價典範所需的多項判準，¹⁷ 這些評價的架構與他採 Lakatos 研究綱領方法論是相契合的，但在一九九七年的文章中並沒有那麼完整談到。相關學者質疑他為何採 Lakatos 的論證上，立論並非無本，但基礎稍嫌薄弱。Vasquez 的架構是這樣的，他首先將討論層次拉高到科學知識的價值，認為科學之首要目的在於產生知識，至於其他目的，諸如增益人類之生活則誠屬附帶效益。科學知識的目的既在產生知識，則評價某一研究典範的必要條件，即在於該典範所能產生知識的能力。具體而言，評價典範的判準來自三方面：精確性 (accuracy)、核心性 (centrality) 與價值 (value)。所謂精確性，指該典範在形式上內含無法被否證的假設數目，如果存在著許多無法否證的假設建構，則精確性較低。因此精確性主要是用以測試理論的經驗內容，事關理論正確預測行為的能力。核心性指的是，典範中的核心命題須能在經過測試後不被否證掉而屹立不搖，這裡的核心性和 Lakatos 所談的理論核心是相通的，強調如果連這些理論中最核心的命題都不能確保，則其它的命題更容易被駁倒，以至於最終被吸納為相對立的理論當中。然而，精確性和

17. 如前述，評價一個典範時，在具體操作上並非直接針對典範，而係對理論系列而來。

核心性都僅指向產生知識的能力，就此而論仍顯不足，知識之外尚須具備價值的意義，此項價值的意義係指具有科學的重要性而非瑣碎的知識（Vasquez, 1998: 123）。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再看 Vasquez 採 Lakatos 研究綱領的方法，並進一步運用檢測理論進步與否的四項判準之作法，就可以相當清楚知道這是體系一貫的。然而，Vasquez 運用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作為理論檢證，是否正確，或有援引不當之處？這攸關 Vasquez 論證的決定性成敗，不可不察。不容諱言者，Vasquez 對於檢測理論進步與否的四項判準之分析較為清晰，而關於 Lakatos 研究綱領的四個要素：理論核心、消極性的誘導、輔助假設構成的保護帶、極積性的誘導等之具體應用，不免浮光掠影，顯有不足之處，這也是 Elman and Elman（1997）批評之所在。不過，雖然 Vasquez 對研究綱領四要素的討論較為欠缺，但以理論核心為例，他並沒有企圖論證現實主義典範的理論核心遭受摧毀，也沒有那麼斬釘截鐵地論斷現實主義論者的世界觀和共同假定隨著理論系列的開創，而有根本的移轉。他所舉的現實主義的核心命題，包括民族國家（nation-states）是國際關係最重要的行為者在內的觀點，並未遭逢根本的挑戰。因此，在理論核心基本不受挑戰的情況下，根本的問題在於其衍生的輔助假設和所謂消極與積極的誘導所影響的理論變遷，是否帶來典範內部發展的倒退。換言之，Vasquez 的主要論點，並無意借由外部其他國際關係理論來挑戰或否定現實主義理論典範的優勢地位，而只是很技巧地強調和運用 Lakatos 的研究綱領，證明現實主義內部理論發展的倒退。至於所謂輔助假設保護帶、消極與積極的誘導等這些判準較為抽象，遠比四項評斷理論由 T 到 T' 是進步或是退化的指標不易操作化，Vasquez 在應用 Lakatos 的方法時有所篩選而較少具體談及前者，這應是可理解的。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Vasquez 對 Lakatos 方法的運用，作者個人基本上認為並無過當之處。

既然已經澄清 Vasquez 的主要目的在於證明現實主義的發展是理論的退化，而非一舉否證整個理論和典範，同時也檢討採 Lakatos 方法論的適當性。

則剩下的問題在於究竟 Vasquez 採用 Lakatos 的科學綱領方法論來論證現實主義理論的倒退之作法是否成功？對於這個問題，關鍵在於現實主義理論中一系列的理論，諸如權力的平衡、危脅平衡、利益的平衡和依附效應等研究，還有對兩極體系和多極的研究中，如權力平衡、推諉、結盟等理論的發展或問題移轉（即從 T 到 T'）是否提供「超量」的經驗內容，是否預言更多的新事實，還是使整個理論系列產生如擲銅板時「人頭面，我贏，數字面，你輸」的情況？換言之，導致無論何種情況，現實主義典範中都有相對應的理論能站得住腳，而立於不敗之地？Vasquez 的回答是斬釘截鐵的，當然其觀點容有商榷的空間，但至少他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批評觀點。¹⁸

（二）對回應者的再回應

許多回應 Vasquez 的學者指出，Vasquez 以 Waltz 的理論為現實主義之代表而攻擊之，是誤以為現實主義只是單一理論，我覺得這種回應也是一種誤解。Vasquez 已強調，他僅針對平衡理論這緊密相連的一系列理論（研究綱領的具體化）為主要評價對象，並未將現實主義典範的所有研究綱領全數納入討論，這一點的澄清很重要。至於 Waltz 指評估一理論的能力，解釋要比預測來得重要，此一觀點，應站得住腳。

Elman and Elman（1997）回應 Vasquez 時指出，只有更好的理論才能取代一個理論，這也顯示科學的研究綱領方法論的好或壞，其實是比較性的，而非絕對的。此一觀點也沒有錯，但 Vasquez 的主要目的不在於證明現實主

18. 在經濟學界，也曾有學者以 Lakatos 的方法論為基礎之著作而掀起的重大論戰。這是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cs Explain*，作者 Mark Blaug 採取了嚴格的否認主義立場，並且根據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對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進行相當尖銳的批判。雖然有許多學者不同意 Blaug 的觀點，但也正是他強硬而富爭議的立場激發了許多學者之間的對話，並進而帶動了研究經濟學方法論的風潮。由於該書的成功，Lakatos 的科學哲學也因而成為當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焦點之一（劉孟奇，1999：102）。Vasquez 在國際關係領域的壯舉是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無法相提並論，這也涉及到兩種學科在性質上的不同。

義可被其他理論所取代，而在說明該理論的倒退，亦即沒有產生理論上進步的問題之轉換。要證明理論的進化與否，只要有好的指標，並不需要與外部的其他理論做對照。Walt 指 Vasquez 為什麼要用 Lakatos 的判準，認為這是許多科學家早已不用的，同時也批評 Lakatos 的「理論核心」不受挑戰之說、以及新理論要能預見超額的「新的事實才是進步」等等說法。然而，Walt 也沒有指出捨棄 Lakatos 的判準不用，要以何種判準取而代之，並且，一項觀點很少人主張或支持，與其價值的高低是不相關的。其實，如果仔細考察，多數回應者原則上還是接受了 Vasquez 採 Lakatos 判準的作法。再者，Walt 質疑 Lakatos 忽略事實上理論核心也常是爭論重點之所在，但其實這非 Vasquez 的論述要旨，已如前述。Walt 同時質疑 Lakatos 判定新事實的經驗內容的比較在實踐上是有困難的，這使得所謂「進步」（progressive）此一概念的測量難以操作化，但 Walt 這樣的質疑也不完全公允，新事實的判定固然存在困難，但並不能據此否定上述判準存在的必要，如依 Walt 的觀點，則我們幾乎很難期待許多社會科學知識和理論的建立。

至於 Schweller 的回應，則相當中肯，即現實主義主要的問題不在於不斷出現的修正，而是在於缺乏明確揭示的範圍條件（underspecified scope conditions），同時也接受 Lakatos 的理論核心、輔助性假設的保護帶的觀點。然而，Schweller 說現實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和世界觀，因而超越了特定的命題或可受測試的假設，這幾乎已經和 Vasquez 在不同的層次上對話了，這種交鋒似難有焦點，如依 Schweller 的觀點，則究竟要怎樣才算是否證了現實主義理論？

六、結 論

Vasquez 採 Lakatos (1970) 所建構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標準，直指當前現實主義典範的退化。現實主義在這過去二十年來所明白展現的理論上的豐富性，根本即是此一典範倒退的表現。由於無法直接對典範進行評估，而必須就典範之下的研究綱領做論斷，Vasquez 因此以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理論研究綱領——即平衡研究的相關理論系列，包括平衡 / 依附、結盟 / 推諉這兩組理論進行評估。其結論是，該研究綱領之一系列理論在整體上充滿著相互衝突的假設，但面臨經驗證據的考驗時，卻至少有其中一個可以通過測試。由於沒有提供新事實，這是典範的退步。換言之，其理論命題上相當豐富，難以被否證。否證性低，概率高，經驗事實少，不是理論進步的好現象。此一根本的質疑，引來相關學者的全力回應，構成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新論辯。

本文描繪了該論辯中的主要觀點，並且提出了個人的淺見。作者認為，Vasquez 的觀點確有獨到之處，然而其立論亦有缺憾。他引用 Lakatos 的判準作為評價前提，聲稱這是多數研究者所採用的，但可惜這前提並未為相關學者所接受。此外，Lakatos 研究綱領方法論的核心要項，諸如關於理論核心、輔助假設的保護帶、消極與積極的誘導，不免生硬難懂，Vasquez 也沒有適當的引用和詮釋。Vasquez 被質疑簡化不同理論觀點的缺失，導致被引用觀點之學者不同意其二手詮釋，甚且，該文以 Waltz 的新現實主義之權力平衡理論為基點並舉其他重要研究為例之論證，此種縮限焦點的方式雖然其本人於文中明確交待，但仍構成推論上的基本缺憾。儘管如此，若干學者的回應似乎難以在不同層次上和 Vasquez 對話，因而難有交集。再者，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仍不脫一九七〇年代以前科學哲學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主所建構之特性，且其理論不免艱澀，令人望而生畏，能否普遍適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評估，也不無疑問。在政治學的研究中，許多「理論」如按其標準來看，

似將難以成立，更遑論檢證其進步與否。¹⁹ 還有，其方法論並不適合用在單一理論的評估上，較適合用在能涵容一系列理論的研究典範。然而，任何方法論必然有其侷限，這都不應構成其方法論致命的缺點，尤其是對於追求科學知識的政治學研究者而言。Lakatos 仍不愧為當代最重要的科學哲學家之一，是「否證主義」的集大成者，其觀點十分細膩，舉凡精緻的否證主義、理論系列、以及判別問題轉換的進步或退步之四項判準，仍具高度啓發性。Vasquez 慧眼識英雄，以 Lakatos 的方法論評估現實主義典範的成就，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其觀點和所開啓的新論戰，應值得學界持續關注。

參考書目

- Brooks, Stephen G. 1997. "Duel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Summer): 445-77.
- Buzan, Barry. 1996.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ensen, Thomas J., and Jack Snyder. 1990.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Spring): 137-168.
- . 1997.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ive Allia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December): 919-922.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1997. "Lakatos and Neorealism: A Reply

19. 如將理論作最廣義的界定，則包括諸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洛克、馬克思等學者的著作論點。在二次大戰之前的社會科學「理論」，幾乎只包含哲學各種不同的形式，尤其強調道德哲學，亦即事物「應該」（ought to be）是如何。由於它們旨在陳述某種價值判斷，無法進行經驗的驗證，所以並無所謂真偽存在。這種意義的理論，如就當代社會科學的標準來看，就不屬於理論或科學的理論（Frankfort-Nachmias, 1998: 47）。

- to Vasquez.”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December): 923-926.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1990.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st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atos, Imre.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Lakatos, Imre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gen, Hans J.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rev. ed. New York: Knopf.
- Popper, Karl.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and New York.
- Rosenau, James N., and Mary Durfee. 1995. *Thinking Theory Thoroughly: Coherent Approaches to an Incoherent World*. Westview Press.
- Schroeder, Paul W. 1994.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Summer): 108-148.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7.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December): 927-930.
- .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Summer): 72-107.
- Van Evera, Stephen. 1984. “The Cult of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Summer): 58-107.
- Vasquez, John A. 1997.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December): 899-912.

- . 1998.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squez, John A., and Colin Elman. 2002.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Prentice Hall.
- Viotti, Paul R., and Mark V. Kauppi. 199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and Beyond*. Allyn and Bacon.
- Walt, Stephen M. 1997.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December): 931-935.
- .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 1997.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December): 913-918.
- Wæver, Ole. 199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mith, Steve,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ankfort-Nachmias, Chava, and David Nachmias 著。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冊）》。潘明宏譯。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 孔恩（Thomas Kuhn）著。1993。〈對批評的答覆〉。拉卡托斯（Imre Lakatos）、馬斯格雷夫（Alan Musgrave）編《批判與知識的增長》。周寄中譯。台北：桂冠出版。
-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著。1987。《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傅季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 。1989。《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程實定、結構群譯。台北：結構群。
- 江天驥。1988。《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台北：谷風出版。
-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著。1993。〈否證與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拉卡托

- 斯 (Imre Lakatos)、馬斯格雷夫 (Alan Musgrave) 編《批判與知識的增長》。
周寄中譯。台北：桂冠出版。
- 莫大華。1999。〈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39，12：
65-90。
- 勞登 (Larry Loudan) 著。1992。《科學的進步與問題》。陳衛平譯。台北：桂
冠出版。
- 瑪格麗特、瑪斯特曼 (Margaret Mastermann) 著。1993。〈典範的本質〉。拉卡
托斯 (Imre Lakatos)、馬斯格雷夫 (Alan Musgrave) 編《批判與知識的增
長》。周寄中譯。台北：桂冠出版。
- 劉孟奇。1999。〈Lakatos 之科學哲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經濟論文叢刊》27，
1：101-142。
- 戴東源。1997。《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The Debate on Realist Paradigm as a Progressive or Degenerative Research Program: An Analysis of Vasquez's Assessment

Hongming Chen *

With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quiry, the debate over the adequacy of the realist paradigm has been fairly extensive since the 1970s. While several analysts argue that, despite anomalies, the realism paradigm is dominant because it is more fertile than its rivals, Vasquez has challenged it. In order to test realism paradigm's research program, Vasquez applies Lakatos's criterion that a series of related theories must produce problems that are progressive rather than degenerating to appraise the adequacy of realist-based theories on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dvanced by neotraditionalists. Vasquez's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ealism research program is seen as degenerating. Of course realism researchers, especially those whom he cited, do not accept this challeng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is new debate.

Key words: realism, neorealism, paradigm, research program, falsificationism, balancing of power

* Lecturer,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